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十八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

天 津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八四年七月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印张 2插页 180千字

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500

统一书号:11072·151

定 价: 0.84元

目 录

五十自述·····	郑天挺 (1)
郑天挺先生事略·····	郑克晟 (28)
从辛勤培植到春色满园——怀念姜立夫先生·····	吴大任 (39)
回忆慈爱的先叔父姜立夫教授·····	姜淑雁 (54)
回忆柳亚子先生在重庆南开中学·····	张镜潭 (59)
天津粮食批发商业百年史·····	朱仙舟 (67)
天津酿酒业发展沿革·····	董梦松 (105)
英美三大油行侵入天津概述·····	闵 文 (113)
美商天津德士古火油公司三十年掠夺纪实 ·····	郭幼丹 吴铁凡 周希钱 (128)
解放前天津的汽车洋行·····	刘家祥 王德春 (143)
天津城市园林史概述·····	张春泽 魏德保 傅克勤 (153)
河北梆子直隶新派的形成和演变·····	王冠生 (163)
天津市河北梆子剧团三十年的回顾·····	王 韧 (176)
“小小百花多异彩”·····	王 韧 (182)
银达子及其艺术成就·····	李邦佐 (191)
韩俊卿的艺术生涯·····	甄光俊 (197)

中国魔术纵横谈..... 曾国珍(224)

• 补白 •

郑天挺教授事迹点滴 (27) “老南开” 喻传鉴 (66)

京剧梆子兼长的小达子 (175)

五十自述*

郑天挺

我原名郑庆甦，字毅生，福建长乐人，一八九九年八月九日（农历七月初四）生于北京。

父亲郑叔忱是清末科举时代的一个知识分子。他是光绪十六年（1890）的进士，后在翰林院任职，光绪二十年（1894）做过顺天乡试的同考官，庚子（1900）以后又到奉天（沈阳）做过一年多的学政。后以丁忧回到北京，在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前身）做过很短时期的教务提调（教务长），于一九〇五年病死，那时他才四十二岁，我只有六岁。父亲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直接印象，我只在亲戚谈话中和他遗留下来的藏书，知道他是一个留心新政和爱好文史的封建教育官吏。

母亲叫陆嘉坤，是广西临桂人，一八九六年和我父亲结婚。她亦通经史，热心于教书。父亲死后未留下什么产业，由于家庭生活，她应傅增湘之聘，到天津担任北洋高等女学堂总教习。那时女子还没有到社会上工作的风气，许多亲友不赞成她去，她没有接受这种保守意见，孤儿寡母毅然相携来津。不到

* 本文系郑天挺教授生前应本会之请而撰写的回忆录，脱稿于一九八一年。所叙经历止于一九四九年，故题为《五十自述》。谨就发表这篇遗稿之机，对郑天挺教授表示深切悼念之意。

一年，她也因患白喉病死了。那时她三十七岁，我只有七岁。接着，比我大两岁的姐姐和一个弟弟又先后病死，家中只剩下我和一个比我小五岁的弟弟——郑庆珏（字少丹）。由于我们兄弟二人年龄太小，于是在亲友的帮助下，寄养在姨母家中。

我的姨父母也早死，家中有两位表兄：张耀曾和张辉曾。是时张耀曾正在日本留学，所以我寄居张家时，由张辉曾教我读书。他是搞程朱理学的，律己责人都很严，我思想上受他的影响很大。

一九〇七年，我年八岁，在北京入闽学堂上学。这是福建同乡在北京设立的。那时候各省旅京同乡大都设有学堂，不是仅培养本省子弟，外省人也可入学。我入的是初小，只一年，因班上只有五个人，于是将这一班停办，介绍我到江苏学堂去读书。那时的学堂是春季始业。一九〇八年，我在这个学校也读了一年。

一九〇九年，闽学堂成立高小，我又回到该校读书。读了两年，到一九一〇年冬，同乡会因经费不足停办了这个学堂，于是又离开。

清朝末年设立的学堂，还是以读经为主，不过读的方式与私塾不同了。我在小学的几年，主要读物还是《书经》、《诗经》等，另加上修身、作文、算术、史地，都很浅。在这时期的同学中，与我较熟的有杨健（壮飞）、庄绍祖、周一鹤等人。杨是广东香山人^①。当时由于葡萄牙侵占澳门，许多香山人都印了不少图片，反对这一侵略行径。杨也把这些图片拿来给我们看。庄是福建惠安人，他的亲友中有许多华侨，传来了不少反

^① 杨壮飞后入天津南开，与周恩来总理同学。总理到日本前曾去北京，我曾陪杨一起到打磨厂天达店看望过总理。

满的言论。这两件事在我的幼小心灵中，印象很深，虽然那时还不了解什么是革命。

一九一一年，我十二岁，考入顺天高等学堂的中学一年级。同班人很多，都比我年长，同年的只有几位。所学课程很深。记得修身一课读的是节本《明儒学案》，完全不懂。英文、数学程度亦高。当时自己又不用功，喜踢球，所以跟不上班。到了秋天，武昌起义，学校停办，就不读了。这一年中，使我印象深的就是练兵操。因为当时列强要瓜分中国的话盛行，所以高班同学发动课外军事练习，称为兵操。我参加了操练，但背不动枪（不是教育枪），只是随队走走。

武昌起义和推翻清朝这一巨大变化，对我家没有什么影响而是令人欢欣鼓舞的。因为家中这时没有在清朝做官的人，我寄居的张家也是如此。张耀曾这时在日本参加了同盟会，编辑《云南》杂志，接受了反满思想。他经常往家中寄回一些刊物，多是号召推翻清朝的革命书籍。所以我当时年纪虽小，但却非常高兴。今天还能记得当时剪掉发辮的快活。当清帝退位，南北统一，我也曾高兴得手舞足蹈。

一九一二年夏，我和弟弟单独赁房过活。那年夏天，我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即师大附中前身），直至一九一六年离开。这四年中，学校督促不严，家中也没人教管，自己又喜玩球不读书，以故成绩不好，一九一五年曾留级一年。经过这一教训，我才折节读书，但所读又不全依学校规定，而是喜欢读父亲遗在家中的文史书籍。

一九一六年暑假前，杨健从南开中学回京，劝我一同到北京大学补习，准备报考北大预科。考后，他被录取，我仍须在补习班，很不乐意。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金价低

落，我同周一鹤曾幻想到德国留学（当时中国尚未对德宣战）。但是我们哪有这个力量，因此念了两个月的德文就算了。

在这四年中学生活中，以一九一五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款事件对我刺激最大，印象最深。这时全国掀起反日高潮，抵制日货。到处将岳飞写的“还我河山”以及从岳飞所写《出师表》中集出来的“勿忘四年五月七日之事”（日本提出最后通牒那一天）的传单印刷分送，我家的墙上也贴了好几张。同时也不再购买日货。那年我有一次和张耀曾到玉泉山去玩，他在塔上题诗，也是骂袁的。

在中学的同学，熟悉的有王鸿翩（翼如）、姚銓、何秉坤（后名墨，字秋江）。这几个人都非常喜欢中国书画、刻印和古董，我受他们的影响，也喜爱了起来。

一九一六年夏，我十七岁。既没考上大学，也没再念中学，只在家自学了一年。这一年可以说是闭门专读中国史籍，不论经史杂书，每天开始一卷卷地读。开始读时没有什么系统，也没有师承，仅是把家中父亲所藏的书胡乱瞎看。后来自己逐步摸索出一条捷径，给我后来学习文史创造了条件，养成了读书的习惯，也奠定了后来学习的趋向。

这一年我受同学的影响，有了新的转变，开始喜欢谈论时事了。因为杨健有一个朋友陈复光，是清华的学生，这年和我熟起来，他喜欢谈论欧战的情况和一些当时风云一时的人物，当然也孕藏着崇拜英雄的思想。我受他的影响，引起看报的兴趣。和杨、陈每次见面，都要就国内外的大事胡乱谈起来，有时直至深夜。

一九一七年夏，我因为理科太差，报考北大预科没有录取。这年我考上了中国公学大学部（即中国大学），也实在不想

上。恰值这时北大第二次招生，我就用郑天挺的名字报考大学本科国文门。当时招考还不限年龄、资格，也不要证书。尤其这次考试不考理科功课，所以被录取了。事后追想，这是一个错误，因为自己许多基础知识学得不够，在后来学习上造成一些困难，而且也局限了自己的成就。

北大录取后，很快就入学。同班三十二人，年龄参差不齐，有的三十多岁，和我同样年龄的约占一半，最小的只有十七岁（罗庸）。这些同学各有所长，大多有“不可一世”之慨。我自知根底差，只有加倍努力，迎头赶上去。所以这时我除学习本系课程外，还要旁听其它方面知识，并须每天读史书。每天除上课外，天天跑图书馆，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连报纸都很少看了。即或偶尔一看，也是把它当成历史故事看。

一九一八年，我十九岁，这时北大的同学很活跃，有三种不同方面的刊物出版：《新潮》，《国民》，《国故》。但我们班的同学却仍然各自埋头读书，很少参加活动。记得有一人给《国故》送了一篇稿子，受到同学们揶揄。大家都自命清高，认为投稿是自己炫耀才识，颇不以为然。我很受这种思想影响，后来不敢也不愿以自己文章就正于人，因而亦就很少写文章。班上的其它同学，也大多如此。

在北大同学中，这时较熟的有郑奠、罗庸、张煦、罗常培（长我一班）等人，他们都是异常用功的，给我鼓励很大。此外还有邓康（中夏）、许宝驹、杨亮功、萧稟原、王友颙、许本裕（惇士）、彭仲铎等。

从这年起，我又在贵州老学者姚华先生家听他讲文章，讲金石文字。同听讲的有俞士镇、王翼如、罗承侨（惠伯）、汪谦（受益）、周一鹤等十几人，每周末晚间一次。

这年冬天，我的监护人梁济先生死了。我外祖母姓梁，梁济是我的表舅，我母亲临终前曾委托他照顾我们，他有两个儿子，即梁凯溟及梁漱溟，是我的表兄。

一九一九年，我二十岁，仍在北大学习。这年五月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我也走出了书斋，参加了学生会的工作。我曾代表北大到天津南开中学联系了一次，并走向街头，作了一些宣传活动。到了十一月，日本帝国主义在福州残杀中国人民，并派海军陆战队登陆威胁。当时福州的学生曾愤怒地举行示威游行，北京的福建学生也起来响应，组织旅京福建学生联合会，抗议日本的暴行。我当时也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到街头讲演，宣传不买日货，并为学生联合会募捐筹款，举办游艺会等。当时会中还出版《闽潮周刊》，我曾用“攫日”笔名写文章，宣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会中还曾向北洋政府外交部多次请过愿。

“五四”运动及福建学生运动（即“闽案”）时，和我常在一起的有郭梦良（弼藩）、徐其湘（六儿）、朱谦之、郑振铎、黄英（庐隐）、许地山、龚启璠（礼贤）、张忠稼（哲农）、刘庆平、高兴伟等人。大家都是福建人，其中郑振铎还是我的本家侄子，以后过从亦多。

一九二〇年春天，福建学生运动仍在进行。这时有十几个福建学生在北京组织了一个S.R. (Social Reformation) 学会，意即社会改革。除了朱谦之、许地山外，前面说的那些人都参加了。另外还有女高师几个人，记得北大有郭梦良、徐其湘和我，师大（当时称高师）有张哲农、龚礼贤、刘庆平，女高师有黄庐隐、王世瑛、高奇如、何彤，清华有王世圻，师大附中有高仕圻，铁路学校有郑振铎，汇文中学有林昶，共十四人。这个

会并没有公开。大家原想共同学习些社会改革的新思潮和新东西，但因为很快即到暑假，大多数人都毕业四散了，无形中就瓦解了。这个会没有组织形式，没有负责人，仅是各人按姓名笔画用英文字母排列个次序。朱谦之也是北大的福建同学，颇有才气，看书也多，他当时是无政府主义者，不谈社会改革问题，所以没有加入。郭梦良后来与黄庐隐结婚，在上海法政大学任过教务长，一九二五年即病死^①。

这年暑假大学临毕业前，同班邓康（中夏）曾来信，鼓励我研究社会主义，我曾复信表示同意。但当时研究社会主义的人五花八门，我认识也很模糊。在复信中我批评一些假社会主义者，如罗家伦等人，我说：“罗还动手打拉洋车夫，这算什么社会主义！”我当时只看见了贫富的悬殊，同情贫者，但并没有研究社会主义走上革命的路。

一九二〇年夏，我在北大毕业。我父亲一个老朋友张元奇在北洋政府经济调查局任职，叫我去当编辑科科员。不到一个月，这个局就解散了。后来我的表姐夫柴春霖在北京办了一个《中国民报》，拉我去帮忙，我去了几个星期。这时陈嘉庚托邓萃英筹备厦门大学，龚启镒将我介绍给邓去教书。因为学校年后才能开学，我在京准备功课。这年秋，我在北京西南郊买了坟地葬了父母。我父母死了已十几年，始终未下葬。按照当时传说，人死要归葬原籍。我这时才自己决定葬在北京，当然还是有人很不赞成。

^①郭与黄于1924年1月13日在上海结婚，当时我曾撰联向他们祝贺。联曰：“积三载同心宿愿始偿，趁吉日良辰一霎衷素；结百年好合旧盟重溯，正新梅艳雪交映园庭。”盖他们两人三年前以文字订交，久欲婚而未果，此联则全系纪实。

一九二一年阴历正月，我离北京南下到厦门。这是我第一次到南方，第一次看到长江，又第一次航海，一切给我以新印象，思想上也有些变化。我的住地面临大海，到处是来往的帆船，汽船都很少。记得当时只陈嘉庚先生是坐汽船。

这时厦大还在集美，尚未招生。我到校后就帮助招生和其它筹备工作，并布置图书室，整理图书。四月初，学校开学，记得是在演武厅举行的厦大奠基典礼。当时还搭了一个牌楼，是我写的横书和对联。横书是：“南国启运”四字，对联已记不起来了。上课后，我教国文课。这时在厦大的同事有何公敢、郑贞文、朱章宝、周予同、刘树杞等人，常在一起的是周和刘。这时的同学，我仅记得有刘思帜等，是年六月，更换校长。暑假时，一部分教师表示辞职离校，我也表示下学期不再来。但是别人已联系好工作，大多去商务印书馆了，而我没有。这件事对我教训很深刻。

回京后，我曾到《京话日报》帮作编辑，这个报是个通俗性小报，为彭翼仲所办。彭是梁凯溟的岳父，是年正死，由梁续办。他找我帮忙参加，同时参加的还有邓康。我去了一个月。

这年秋天，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后改文科研究所）成立，我和张煦、罗庸都入所作研究生。我的研究题目是中国文字音义起源考，由钱玄同先生指导。当时研究所很自由，不必常来，也可以在外工作，在校也只是看书而已。每隔一段时间，研究生和导师集会一次，大家见见面，谈谈。当时陈垣先生也是导师之一。一次在龙树院（一座名刹，在宣外南大洼，介于窑台和陶然亭之间）集会上，陈先生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这几句话当时对我影响最深。

陈老大我十九岁，我每称他先生时，他总是逊谢，表现出一位受人尊敬而又谦虚的学者风度。

我在作研究生期间，在研究所加入了“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参加了明清档案的整理工作，这无论对国家、对我个人都是一件大事情，从而奠定了我以后从事明清史研究的基础。

明清档案原存故宫内阁大库，清末因大库失修渗漏，屡经迁移。民国初年，教育部设立历史博物馆于国子监，将大库迁出而未送还的档案交其保藏。一九一六年历史博物馆移至午门，此项档案也移于此处。一九二一年，教育部与历史博物馆因经费困难，将这批档案之完整者保存一部，其余约八千麻袋全部卖给西单大街同懋增纸店，代价四千元。纸店打算将这些档案送到定兴县纸坊重造粗纸。此事为罗振玉所知，于一九二二年二月，用一万二千元将它买回。与此同时，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知道历史博物馆还保留一部份，因此于是年五月呈请当时的政府，命历史博物馆将这些没有卖掉的档案拨给北京大学，交研究所国学门同史学系组织委员会代为整理。五月下旬得到允许，几经交涉，七月这批档案才由历史博物馆陆续移运到校，共计六十二箱又一千五百零二麻袋。我于这年七月下旬参加了这一有意义的工作。当时曾把这件事特别记录下来，现抄录如下：

1922年7月26日（壬戌年六月初三）星期三

上午至北京大学整理档案也。

民国成立，前清内阁档案移至教育部历史博物馆，近复移至大学整理。大学因设专员司之，余与其列。今日余

整者雍正题本，即奏折也。有可记者数事：

一、题本皆白折无格。前汉文（多小楷或宋体字）后满文。本至内阁，摘由粘于后，而后进呈。皇上则朱批或蓝墨批于首。

二、朱批诸字字体整齐，近赵孟頫，亦有甚劣者。

三、满洲诸臣题本皆称臣（如刑部尚书德明等），与旧闻概称奴才者不同。

四、京中各部均方印，总兵亦方印，而巡抚反长方印。

更有一事最有趣者：今日见一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云南提督蔡成贵，奏贺雍正即位表中云：“近奉到即位恩诏”云云。按雍正在位止十三年，此表到日恐帝崩久矣。但不知贺表何竟迟至是时方发，而即位诏何至是而至也。

我参加这项工作历时不长，就为别的事情所代替。

我于一九二一年秋天和周馥（稚眉）结婚，添了家庭负担，这时的生活更加困难，因为必须找到兼职工作，以补家用之不足。正好这时张耀曾作法权讨论会会长，于是在一九二二年九月让我去当他的秘书。

法权讨论会是当时政府筹备收回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的机构，会中曾保存了大批中外文献及一些外交档案。当时主要工作在翻译中国法典为英法文。我外文不行，只好编写汉文资料。我从阅读这些文献中，增加了许多知识，扩大了视野。我特别注意到领事裁判权的问题。于是乃以该会名义撰写了《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一书，于一九二三年八月正式出版。这部书是我编撰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书中开首，先就帝

国主义在我国设立领事裁判权的侵略行径加以揭露，认为外国对此问题的著述，大多为在中国设立领事裁判权进行辩解，没有涉及到实质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除表明系“强者（帝国主义）蔑视弱者（殖民地国家）一语而外，殆更无重大之根据也。”此外，该书又就帝国主义在华领事裁判权之沿革、内容及中国撤废领事裁判权之经过，作了一些论述。书中指出，领事裁判权明确确定而立于条约中，系一八四三年（道光二十三年）中英五口通商条约第十三款，但语意尚较为含混。随后又与英、法、意等国订约，则领事裁判权制度已于此时明确确立，这时“我国已全失其治理外人之权”。书中第五章还列举种种事实，揭露领事裁判权侵害中国主权，紊乱中国之治安秩序，轻视中国人民权利，妨害经济及一切文明事业之发达，等等，主张领事裁判权必须撤废。该书出版后，曾获得当时一些法学家的好评，刘师舜并曾撰文称道过此书。但事实上，该书在论述上仍有很多不足。我在会中张耀曾还让我编写《中国司法小史》，初稿已成，后因我南下工作，该会亦取消，遂作罢。

当时法权讨论会的薪水很少，不足以养家，只好到各校兼课。一九二二年，经郑真先生介绍我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女高师）教书，同时还在北京法政大学、市立一中、春明公学、私立华北大学、励群学院兼课。当时课兼得很杂，主要是因为生活负担加重，只好如此。到一九二四年夏，我到北大作讲师，有了固定收入，这种到处兼课的情况才减少了。

一九二二年十月，福建发生政变，驱逐了北洋军阀的督军，由广东军政府的北伐军进入福建。当时张哲农任福州第一中学校校长，找几位北京的福建人去帮忙。十一月底，我和郭

梦良、朱谦之一起回福建。这是我第一次回到家乡，见到了伯母、婶母和堂兄等人。我们住在第一中学（旧凤池书院），但没有上课。不久北伐军退回广东讨伐陈炯明，政变失败，我也就离闽回京。在闽仅呆了一个月。

一九二六年春，那时北洋政府财政异常混乱，特别是教育经费更加困难，经常欠薪，每月经费不过发一成馀。高等学校经常罢课，表示抗议。这时北洋政府有人提议把教育经费是否独立核算，另作计划。于是当时的教育部曾一度成立一专门机构，名教育特税公署，进行管理，由马叙伦先生主持。马先生是我在北大时的老师，当时任教育部次长。他找到了我班同学许宝驹，许又把我介绍给他，成了他的部下。但这个机构，仅是北洋军阀政府的一个骗局，只存在了一个月，昙花一现就完了。我们曾拟定了几个计划书，完全成了一堆废纸。

这年三月，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非法解散北京女师大，全校师生大愤，进行抵制。当时鲁迅先生和许寿裳等人曾另觅定校址为学生上课。我这时仍在女师大兼课，曾参加了讲课，并抗议解聘。这年三月十八日，执政府卫队一手制造了对广大学生的血腥屠杀，即“三一八”惨案。当时北大学生死三人，其中两个是我的学生，女师大所死二人，也是我的学生。女师大刘和珍同学，家极贫穷，上有母，下有弟，一衰一幼，颇值同情。三月二十五日上午，我参加了全校师生为死难学生召开的追悼会，会上师生均异常愤慨，对执政府制造流血事件表示抗议。会后，我曾给郑介石（莫）写信，发动一些教师对死难家属募捐。当时许多人都表示支持此议。记得当时郑介石、张怡荪、李仲侃等均各助十元，我也捐了二十元。

一九二七年上半年，我仍在北大教书，并在法权讨论会工

作。当时北洋政府欠薪更为严重，有时仅能拿到月薪的十分之一二，家中生活也异常困难。是年五月，马叙伦先生任浙江民政厅长，许宝驹来电约我去杭州。六月底，学校课程结束后，我即由海道经大连南下。七月初到杭州，和罗常培、章廷谦（川岛）同住一起。马先生初发表我为科长，因我晚到，且没有实际行政经验，到厅之后改任秘书。八月，马先生辞职，令我代拆代行，负责移交。是月底我也辞职。许多朋友劝我不辞，留在杭州，但九月我仍从海道回到北京。这时北洋军阀合并了北京的几个大学，北大旧人多数离校，我也没有再回去教书。法权会也于此时改组，机构撤消，我失业了。

一九二八年二月，表兄梁漱溟在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任职，邀我去广州协助他工作。我也感到在北方甚烦闷，想去南方工作。这时罗庸约我再赴杭州，那边几位老同学也敦促前往。我们遂于三月中南下，下旬到达杭州，这时蒋梦麟任浙江大学校长，他让我暑假后到浙大任秘书。在假期前的几个月，又把我推荐到浙江禁烟局当秘书，以为过渡。蒋梦麟原是我北大的老师，此前并无深交，主要还是通过马裕藻先生及北大几位老同学的介绍。但是，在杭州并无适当的工作好做，于是于是年五月到了广州。是时梁漱溟任建设委员会常委，我任秘书。

建设委员会的工作本极无聊，事情也不多，每天或草文件，或任会议记录，开起会来大多议而不决，全系空谈。加以当时官场各种关系异常复杂，而我亦不精于此道，所以决心早日离去。幸好当时罗常培、丁山等均任教于中大，得以每日谈论学问，由于他们的鼓励，我才开始写作。不久，朱谦之亦来广州，有时一起辩论问题几至通宵达旦。记得有一次我和朱曾就中国史料问题展开辩论。他认为：中国史料无一可信，我则认